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民俗文化研究

——以生命礼仪为例

林皓天 蔡文豪 来浩瑜 方振阳 高屹贤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4

摘要：本研究聚焦江苏省内传统民俗的现状与发展困境，重点考察了三个层面：地区间彩礼差异的形成原因、民俗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以及政府改革政策的实施成效。研究团队在2024-2025年期间，对江苏省13个城市开展了系统的田野调查，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同时，选取南通市“禁燃禁售”政策实施过程作为典型案例，分析政策执行中的现实困境；并考察民俗产业化的创新实践。主要发现包括：江苏省彩礼金额呈现明显的南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结构和地域文化传统三方面因素；有效的民俗政策需要平衡文化保护与社会接受度；传统民俗转化为文旅体验项目，具有促进乡村发展的潜力。这些发现为理解当代民俗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乡村振兴；生命礼仪；民俗改革

现代社会高速工业化的发展与舶来文化的冲击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民俗应当以怎样的形式跟上时代的脚步，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与陋习划清界限，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创造经济效益？中央民族大学的林继富、何佩雯以“革命民歌”为例，探讨了传统民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创新发展，为当下的传统民俗创新发展提供参考案例^[1]。复旦大学王尚慧将彩礼与嫁妆并称为“婚姻支付”，根据婚姻支付的高低与均衡性进行分类，为天价彩礼的治理提供全新的视野^[2]。本文的研究以江苏省内具体案例为例，为该地区民俗改革提供参考指引，

以期为乡村振兴做出一些贡献。

1. 空间视域下的生命礼仪：传统民俗的地域性差异与文化认同

为了得到江苏省内婚姻支付的一手资料，笔者于2024年5月至2025年5月之间，对省内各市的婚姻支付水平进行了调查。调查通过运用对省内不同地区民众进行实地访谈与集中座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所查阅的资料对江苏省内各个城市在生命礼仪的差异进行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制作了以下表格。

表1 江苏省内各市彩礼支付情况统计表

城市	彩礼常见金额	备注
南京	5万以下或10万左右	市区普遍偏低，如1.88万、2.88万等，但会要求男方提供婚房
无锡	10到20万	部分家庭或高达88.8万
徐州	10万到20万	返还部分或者以房产、车辆等为嫁妆
常州	10万到30万	取吉祥数字
苏州	7到20万之间	市区往往会要求男方提供婚房
南通	18.8万到40万之间	要求搭配婚房
连云港	5到10万	女方嫁妆多为汽车或现金返还
淮安	5到8万	
盐城	6到9万	若男方已购房车，金额可能更低
扬州	5万以下	常见金额例如1.88万或2.88万
镇江	6.8万到8.8万	
泰州	5到10万	
宿迁	5到20万之间	

据研究，江苏省内彩礼支付的情况具有较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大致呈现南多北少的特点。其中南通市的平均彩礼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城市，无锡市的彩礼水平其次。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往往会由经济、文化、阶层差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经济水平是彩礼规模的根本。一般而言，富裕的家庭拥有给予更高规格彩礼的能力与意愿，而对被给予彩礼的要求较低；较不富裕的家庭对于给予彩礼的能力与意愿较低，对被给予彩礼的要求较高。

传统的家庭观念是影响彩礼水平的重要因素。彩礼在传统上往往被视为男方家庭对于女方家庭损失劳动力的补偿，这一补偿不仅仅针对女方的父母，同时也关系到女方家庭中

的其他子女。因此，多子女家庭对于彩礼的要求常常高于独生子女家庭。江苏省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江苏省人口普查年鉴 2020》对各省辖市按活产子女数分的 15-64 岁妇女人数进行了统计，通过该数据差异可以反映出各地独生子女相对比例的高低。

根据统计数据，苏南地区的独生子女率普遍高于 50%，苏中地区的独生子女率更是高于 60%，而苏北地区的独生子女率除盐城外，普遍低于 45%，独生子女率较高的地区对于彩礼的要求显著低于独生子女家庭较少的地区。以扬州为例，其非独生子女率全省位列倒数第二，彩礼水平在笔者所做的调查中位列全省倒数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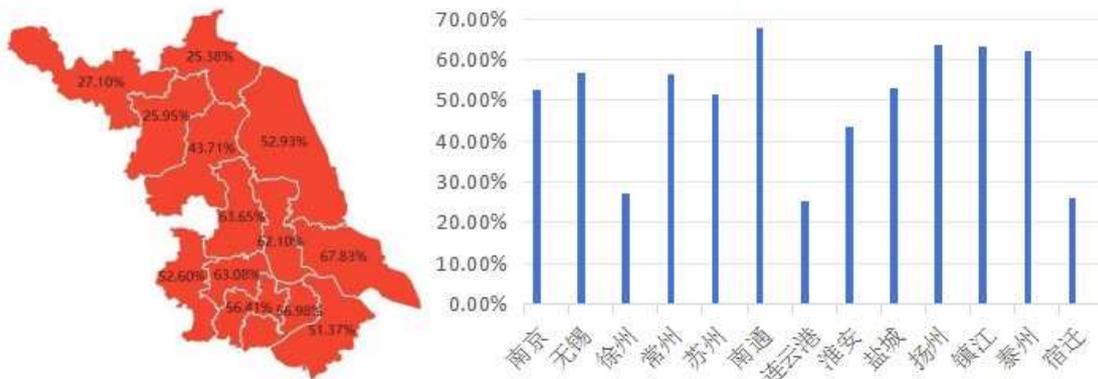


图 1 江苏省各市活产子女数为 1 的 15-64 岁妇女比例示意图

阶层匹配的需要是彩礼的重要催生因素。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诸多观点：厦门大学许弘智与清华大学王天夫认为婚姻关系的缔结与完善会帮助建立并强化双方的主观阶层认同^[3]。武汉大学牟敏娜则提出彩礼要价实际上是双方在婚姻市场中就自身的家庭的经济实力与伦理规范进行参考并匹配的过程^[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各具合理性。阶层内涵比较复杂，是包括家庭状况、收入条件、文化程度等在内一系列复杂因素的集合。双方在婚姻支付上的态度实际上是男女双方家庭在婚姻匹配的过程当中对对方家庭上述因素预期的外在表现，在婚姻支付的商议过程中所出现的分歧与争议则是在初期匹配中出现了不符双方期望值的影响因素。阶层匹配的存在使得各方面条件在婚姻关系在建立过程中得到充分考量，以便双方高效、准确地匹配到符合自身意愿的家庭，无形中增强了的新家庭在共同生活中的稳定性。

新家庭建立的保障与需要是彩礼出现的必然结果。新家

庭在建立之初出现对于大笔资金支持的需要，彩礼中获得的财产恰恰是新夫妻两人的重要支持，是父母对于子女的婚姻支持。夫妻双方彩礼的金钱投入类似于商业交易中的定金，在一定程度上是维系双方感情稳定，限制双方行为的一种特殊方式。使得男女双方对待婚姻更加谨慎忠诚，减少背叛婚姻的行为出现，否则若是婚姻生变便会出现索回彩礼或血本无归的情况出现。

不同的城市居民在习俗观念上的不同会影响彩礼的规模。在实地访谈中，南京、南通、苏州等地居民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南京市居民周某某认为彩礼是一种庆贺的表示，不需要太高。南通市居民丁某某则更倾向于认为彩礼是衡量男女方实力的尺度，在一定的范围内多多益善。苏州市居民陆某某则大多认为彩礼配以陪嫁是婚后新家庭的重要补贴。由此可见，民间观念对于民俗的形成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彩礼在中国传统婚姻礼俗中，历来是婚姻缔结的重要象征，承载着男方对女方的诚意表达。然而当代社会的彩礼习俗却逐渐异化，其金额多寡往往成为婚姻能否达成的关键因素。作为传统“婚姻八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彩礼习俗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需要我们辩证看待。当前部分地区出现的天价彩礼现象，不仅给男方家庭造成沉重经济负担，更使婚姻关系趋于物质化和功利化。为此，应当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乡村振兴的意见》文件中关于治理高额彩礼的政策要求，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同时完善相关监管措施。政府部门需要协同社会各界，共同规范彩礼习俗，使其回归合理范畴，避免对正常婚嫁造成阻碍。

2. 从仪式到重构：传统民俗的现代变迁动力机制研究

传统民俗在历史的进程中大多会因为经济、文化、政策的多重影响而发生变迁。江苏南通的启东、海门地区（以下简称启海地区）的习俗变迁进程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笔者于2024年5月3日在南通市海门区进行调研，当地一名72岁刘姓老人介绍道：

“六十年代前，婚礼服饰一般是自制的，新郎一般着中山装，新娘着印花衣，俱为普通服饰。一般会宴请宾客，根据不同的经济水平，安排六个菜或十二个菜。十二个菜当中，安排红烧肉、鱼肉、大肠、猪肝等大概四五个荤菜。七十年代往后，婚纱开始出现。我结婚的时候，彩礼钱总计200元，订婚、结婚各送100。女方陪嫁为实物，一般为家具，价值应在彩礼钱上下，讲求门当户对。（由于货币购买力的变化，以日工资为例，一名工程师在七十年代的工资为一元五角，在2015年为三百元，可推知七十年代的200元彩礼钱约等于现在的四万元）。2000年左右，结婚的时候新郎穿西装，新娘穿中西式嫁衣或婚纱，但一般是租的，彩礼钱约三万。”

当前，启海地区的聘礼钱以28.8万元为普遍，也有家庭比较富裕的男方会把聘礼提高到68.8万元甚至88.8万元，但是或多或少，男女方都会提前约定返还一定金额的彩礼，如28.8万返还18.8万，68.8万返还48.8万，或者返还一些贵重实物作为陪嫁。从时空角度来观察，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影响力加剧，民众更加倾向于使用金钱而不是传统的道德观念来保障婚姻的忠诚度。

经济水平是决定了传统民俗变迁的根本原因。我国经

过七十余年的经济建设，生产总值于2010年超越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彩礼水平的提升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爆发式增长，人民收入显著提高，消费意愿增强，巨量的资金投入婚庆产业，婚恋市场得到高速发展，彩礼水平也随之水涨船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与完善是推动社会变迁的根本性因素。比起务农，农村青年受到更好的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更倾向于前往城区和发达的大城市。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截至2022年，江苏城镇化率已超过75.04%，这体现了乡村人口受到城市的强势虹吸。“农民”成为了“农民工”，催化了传统家庭的解体与现代家庭的重构，传统的民俗活动因此受到影响，同时意味着乡村作为传统民俗最直观的体现区域在失去了大量人口之后在文化上日渐式微。城镇的变迁以小家庭化、外来人口涌入与本地人口流出为其主要特征。近年来，得益于房地产的高速发展，我国住房供给率持续上升，商品房经济与贷款业务的高度发达加上居民自身收入的保障足以支持年轻夫妇与父母分家。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带来了外地的风俗，与本地的传统民俗碰撞之后进行交融。大量的人口流失造成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衰微，但也推动了人口流入城市文化的交融繁荣。

外来文化的冲击是习俗变革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文化大规模交流互鉴。受此影响，部分民众开始采用西式习俗举办婚礼，例如穿西装、婚纱，甚至会选择在教堂举办婚礼，在总体上体现出“中西交融”的特点。

上述研究揭示，经济发展深刻影响着传统民俗的演变，社会结构变化与文化交融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推进，彩礼上涨和婚庆产业繁荣等现象，生动展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传统家庭模式改变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城乡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正在重塑民俗形态。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保护好传统民俗，又能推动其创新发展；既要避免乡村文化流失，又要实现城乡文化的有机融合。在乡村振兴政策推进过程中，只有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才能让传统民俗保持持久生命力。

3. 政府规制与民俗调适：基于南通市民俗改革政策的实证分析

传统民俗的传承需要服务于现代社会。各地政府需要

积极履行文化职能，以推动传统民俗现代化发展。笔者以江苏省南通市发布2021年的《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以下简称“禁燃”通告）和发布于2024年的《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通告》（以下简称“禁售”通告）为例，探讨政府在民俗改革中的促进作用。

2024年3月25日，南通市发布有关禁止销售殡葬用品的通告，以下为摘录的南通市有关禁止销售殡葬用品的文件原文：

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通告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殡葬改革，摒弃丧葬陋俗，倡导文明祭祀，净化城市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殡葬管理条例》《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通告如下：

全市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销售冥币纸钱、纸扎实物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违反本通告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会同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没收，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行政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南通市民政局
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3月25日

南通市曾在三年前发布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文件，以下为摘录的南通市有关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文件原文：

**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
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

通政规〔2021〕7号

为加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防治环境污染，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南通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市区实际，经市政府研究，决定扩大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现通告如下：

一、下列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略）

二、广大市民应自觉遵守《条例》和本通告规定，积极举报违法行为。举报方式：“110”报警电话、“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三、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对非法经营、运输、储存、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由公安、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城市管理和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通告自2021年1月30日起施行。

南通市人民政府
2021年12月30日

相对于2024年的“禁售”政策，2021年“禁燃”政策的执行过程更加顺利、争议更少。相比之下，两个政策的区别有如下几点：第一，“禁售”政策由南通市民政局与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禁燃”政策由南通市人民政府发布。相比之下，前者只是两个部门间的协作，且并未有文化部门参与，政策在制定时所能参考的因素有限。后者能够协调的部门、资源更多，政策的制定者能够在更广阔的维度上制定政策、支持施行。第二，“禁燃”政策虽然直接禁止了燃放，但是将禁燃范围限定在一定的区域（市区），在其他区县依旧可以燃放。并且，施行过程中有公安等多部门协作，做到了严格的执行，在短期内效果显著。同时，由于近年来由于燃放烟花爆竹而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其危害性深入人心，因此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即便如此，2023年12月26

日“全面禁燃烟花爆竹不合法”这一案例依然出现在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中。全国人大法工委经审查认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应当按照上位法规定的精神予以修改，在法律上对于全国普遍的“禁燃”政策提出质疑。民间也出现了“燃放烟花爆竹是春节的重要传统风俗”的呼声。第三，对于相关部门而言，“禁燃”政策的执行耗费人力物力巨大，执法难度较高，并给执法人员带来了过大的工作压力。因此，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南通市将有关“禁燃”政策的执行力度逐渐放松。“禁售”政策虽然只是禁止了销售，但给群众的影响基本等同于“禁烧”，同时把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地级市，对普通居民的祭祀造成了严重的妨碍。第四，一般而言，燃烧冥币纸钱祭祀较燃放烟花爆竹危险性更低，过去以燃烧冥币纸钱的方式祭祀少有危险事故发生，并无维护生命安全的紧急需要。第五，燃烧冥币纸钱大多用于祭祖，相关部门将燃烧冥币纸钱等祭祀方式全部定义为“封建迷信”，严重伤害了普通民众的感情，打击到了传统的家庭宗族观念，因此引爆舆情，实属正常。

有关禁售政策的缺陷体现在法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政策在出台后饱受当地群众诟病。但与此同时，网络上也出现使用一些大型“纸库”（“纸库”，又称“扎库”，是一种传统殡葬用品，主要用于葬礼和周年祭等重大祭祀活动，通常以纸扎制成房屋、别墅等样式，最后焚烧以寄托哀思。）的视频，反映南通丧葬风俗较为铺张。在法律角度上，禁售《通告》的主要法律依据应当来自《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第40条：禁止制造和销售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其中比较大的争议在于对冥币纸钱“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的定义。毕竟与纸扎相比，冥币纸钱可以算得上是最经济最常见的丧葬用品了，假如冥币纸钱的销售遭到禁止，那么居民的一般祭祀行为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结合时空背景，笔者认为，有关禁售通告的制定，与2024年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贵州等多地烧纸祭祀引发山火、南京电动车充电引起居民楼火灾等，存在较大关联。临近清明，相关部门参考其他城市经验，预防性地制定此政策，从出发点来看，无可厚非。但政策制定者很显然并没有考虑到“社会惯性”：第一，在清明节前夕出此政策，让正在准备祭祖的居民与正在进货的祭祀用品的商家措手不及；第二，没有结合到当地实际情况：南通当地居民焚烧冥币的地点大多在家中或公墓，公墓中设

有专门的焚烧池，往年也鲜少发生事故。因此居民多有怨言，实属常事。另外，网络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南通人在祭祀时普遍喜欢购置“纸库”，规模大且奢靡。



图 2：笔者长辈拍摄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纸库

笔者认为，“南通当地居民普遍祭祀铺张，尤喜置办纸库”的观点不符合实际的。第一，当代南通族群主要由四大移民构成，移民与移民之间习俗差异较大，直到现代还存在显著差异，“南通居民普遍喜欢奢侈祭祀”是一种不了解当地民情的臆想。第二，燃烧“纸库”祭祀高污染、高风险、高耗费，本不是一种广泛受欢迎的祭祀方式。以南通市启东市为例，烧“纸库”一般只会出现在逝者火化当天以及逢“十”的周年忌日。第三，根据当地居民反映，在网络舆情爆发之后，当地的祭祀并未受到较大影响，很多居民选择了在网上购买冥币纸钱，而线下的冥币纸钱销售也并未受到直接的监管。据政府工作人员反映，《通告》的施行由于阻力太大，最终落得了个不了了之的结局。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固然令人反感，但细化政策施行所需的人力物力消耗也令相关部门难以承受。针对民俗的治理是否有更加可行的方法，依旧要在未来继续探索。

时空上的集中性分散性相结合，配合以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跟进是民俗改革成功的必备因素。笔者在南通调研时，根据一位前基层工作人员介绍，早在此次事件之前，于2010年至2015年之间，由南通政府牵头，对政府工作人员下达工作指标，以宣传劝说为主要手段，将大量散落在乡村田间的坟头迁入新建的公共墓地，而政府会提供免费的墓穴。由于没有经济上的顾虑，村民大多愿意配合政府的工作。公共墓地的设施经过改造，已经达到比较完善的水平。而政府因为将改革力量集中在乡村，节约了财政；又因为政策的施行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因此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目前，我国的民俗领域呈现出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文

化与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由于财政能力的制约以及传统观念的抗拒，政府在移风易俗的过程当中居于次要的位置，仅仅起到呼吁与部分物质支持的作用，陋习的去除与落后习俗的现代化改造主要还是依赖于民间经济能力的限制和现代生活与传统民俗的不适配进行自然推进。国家机关过于直接的介入可能会面临的困境包括：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耗费巨大，造成财政负担；民众与政府观念上的冲突导致政策施行艰难，最终都会导致政策实施半途而废。政府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者，应当因地制宜，多多了解民意，明确传统民俗与陋习的界限，制定较为温和的政策，讲求循序渐进，不可一味追求快速见效与一步到位。优先使用经济手段鼓励弘扬传统文化、限制陋习，引进社会资本，探索民俗产业化市场化发展。

4.v 民俗经济与乡村振兴：传统资源的产业化开发模式

传统民俗的改革探索需要坚持经济化发展方向，推动传统民俗与现代产业深度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爱东认为，民俗文化的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二是民俗文化产品的市场化。^[5]这个观点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思路，笔者较为认同。同时笔者认为，民俗文化的市场化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同时借助现代传媒的传播优势提升影响力。

深挖传统婚庆文化与文化品牌输出相结合是发展民俗经济的必由之路。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及民族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复兴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其中，汉服文化借助影视作品的广泛传播，逐渐从亚文化圈层走向大众视野，尤其以汉服婚礼为代表的民俗实践，正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载体。2024年七夕节期间，洛阳隋唐洛阳城景区（唐代皇家园林遗址）举办的“情定洛阳·礼乐华章”汉服集体婚礼具有典型意义。该活动严格遵循周制婚礼仪轨，通过“沃盥净手”“同牢合卺”等仪式展演，不仅实现了传统礼制的现代重构，更通过“汉服婚恋之城”的IP化运营，形成了民俗传承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这一案例表明，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需依托市场化路径，而文化品牌的打造又需根植于民俗内涵的深度挖掘，二者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

扎根传统婚庆文化，利用现代社交媒体打造文化品牌是活化传统婚庆民俗的重要方法。以常州市为例，其下辖溧阳市南渡镇庆丰村打造农旅融合项目“稻花香”，以水稻产

业为核心,每年举办“四美丰收节”“春天里的灯会”“金花节”“风筝节”“萱草文化节”等活动,打造自有文化品牌,吸引婚庆消费,将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现代婚庆产业相结合,并且与艺术院校进行合作、邀请艺术家前来创作宣传,提升产业知名度,成功地把庆丰村从经济薄弱村转型为全国知名的“网红村”,村集体收入从2019年的3万元上涨至2020年的260余万元,2022年达到358万元。项目催生了庆丰馒头店、米酒工坊等特殊店铺,同时带动村民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常州通过非遗产业化、节庆活化、文化IP活化等方式,将传统民俗转变为乡村振兴的核心驱动力,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实现了经济增收与乡村特色发展。

民俗产业化是乡村振兴的硬需求。上述成功案例表明,要让传统民俗焕发新生,就必须在保持文化本真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产业思维和传播手段进行创造性转化。要牢固对文化根脉的守护,更要对当代市场需求积极回应,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双赢局面。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江苏省传统民俗的系统考察,指出传统民俗与现代社会的部分冲突,针对民俗治理中的主要矛盾提出解决建议,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以民俗经济赋能的新思路新方法。通过对江苏省婚姻支付习俗的考察,可以发现地域差异深刻反映了区域经济、家庭结构与社会观念的复杂互动。传统彩礼在现代转型中呈现出双重面向:既维系着婚姻契约的文化功能,又因商业化而面临异化风险。政策实践表明,有效的民俗治理需在文化保护与社会发展间寻求平衡——

南通“禁燃”“禁售”政策的经验教训揭示,简单行政干预往往适得其反,而尊重地方传统的渐进改革更具可持续性。当前,汉服婚礼、农旅融合等创新实践正为传统民俗注入新活力,这提示我们:民俗的现代化转型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使其在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文化凝聚力与经济驱动力。未来,需要建立更加包容的治理框架,既遏制天价彩礼等畸形现象,又为文化创新保留空间,最终实现传统民俗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 [1] 林继富,何佩雯. 中国共产党与民俗文化的传承创新[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6):185-194.
- [2] 王尚慧. 中国家庭婚姻支付的变动趋势、城乡差异与地区模式(1978—2018)[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5,(01):105-119.
- [3] 许弘智,王天夫. 婚姻缔结、家庭财富积累与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3(03):137-151.
- [4] 牟敏娜. 作为“保证金”的彩礼:婚姻契约视角下的江西农村彩礼研究[J]. 当代青年研究,2023,(04):78-89.
- [5] 施爱东. 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传承发展[J]. 人民论坛,2024,(23):96-100.

作者简介: 林皓天(2003—)男,汉族,江苏南京,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民俗文化。

基金项目: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410329027Z